

王应麟学术讨论集

傅璇琮
施孝峰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B244.99
W433

王应麟

学术
讨论集

傅璇琮 主编
施孝峰

B244.99

W433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应麟学术讨论集/傅璇琮,施孝峰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10
ISBN 978-7-302-21002-3

I. 王… II. ①傅… ②施… III. ①王应麟(1223~1296)—人物研究—文集
②王应麟(1223~1296)—学术思想—研究—文集 IV. B244.9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5004 号

责任编辑:马庆洲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李红英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2×228 印 张:17.25 字 数:221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500

定 价:38.00 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034822-01

前 言

王海娟

宋代鸿儒王应麟博古通今、著作宏富、名震朝野，在南宋罕有伦比，后世也多不能望其项背。其学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瑰宝，正如专家所言，王应麟之于宁波，犹如孔子之于曲阜，鲁迅之于绍兴……先贤王应麟是鄞州的骄傲，是鄞州一个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是宁波众多人文资源中的一个闪光点，也是鄞州近年来着力打造的文化名片。整理王应麟的著作，研究其中丰富的学术内涵，让先贤的精神鼓舞后学，让经典的智慧引领后人，让历史的精髓永留后世，是我们的心愿，也是我们的责任。近年来，我区设立“王应麟读书节”，打造“书香之恋、快乐之约”的全民节庆活动品牌，重修《三字经》并在京成功首发，编纂《三字经古本集成》，努力扩大《三字经》及王应麟名贤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力。为了吸引更多英才共同投入到这项艰巨而有意义的工作中，经我国著名学者、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原中华书局总编辑、曾主持《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古典文献整理工作的傅璇琮先生协助，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与鄞州合作，建立“王应麟学术研究基地”。这为我区深入打造王应麟学术品牌，挖掘继承地域文化提供了一个平台。

清华大学是我国一流综合性大学，她拥有着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独立的学术精神、良好的学术氛围和自由的学术环境，在海内外影响卓著。我区王应麟名贤文化建设工程能得到清华大学古典文献

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必能取得良好的成效。目前,对王应麟岿然存世的14种、284卷文献的点校、编纂、出版整理工作正有序进行,王应麟学术研讨会将作为“王应麟学术研究基地”的品牌项目有效发挥其文化平台和学术交流平台的作用。可以说,研究基地的深入运作将会大力弘扬我区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区域文化辐射力,推进鄞州文化强区建设。

今年3月,来自清华、北大、复旦、南大、北师大、中国社科院、台湾慈济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等高校的2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参加由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鄞州区委宣传部、区文联联合主办的“王应麟学术研讨会”,通报王应麟学术著作整理出版工作进展情况,交流专题研究成果。海内外专家学者的论文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又有沟通古今的细致考究,让我们感受到了真知、真学、真行的力量,令本次研讨会既有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的气势,又有百家争鸣兼收并蓄的气度;古典文献的历史传承与复兴国学的现实之路在此接壤,专家们严谨治学的理性精神与鄞州大力开掘名贤文化的工作热情在此交汇,悠久绵长、底蕴深厚的鄞州历史文化的背景与新时代鄞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景在此交叠。将海内外专家思想深刻、严谨朴实的论文汇编成书,付梓出版,是此次王应麟学术研讨会的成果展示,也是我们为做大做强王应麟文化品牌而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此要感谢傅璇琮先生这位以人格魅力和学术建树受到普遍尊敬的长者,作为一名甬籍学问大家,他一直关注着家乡的文化事业,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奔走忙碌;感谢来自德国和我们海峡两岸学者对鄞州乃至中华文化的深切关注和所做努力;感谢清华大学及所有参与王应麟学术著作修订的专家学者,对王应麟著作校勘这一巨大工程的倾力支持及对继承和延续中华文化优秀成果所做的贡献。

是为序。

2009年6月

(作者系中共宁波市鄞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目 录

前 言	王海娟	I
试论王应麟《词学指南》的价值	祝尚书	1
《玉海·艺文》的特色及其价值	刘跃进	18
《玉海·艺文》的价值	傅庆芬	27
《玉海》的版本	武秀成	69
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文献学旨趣发微	刘玉才	78
《通鉴地理通释》的历史地理学成就	傅林祥	91
《四库全书总目·诗地理考》略评	刘 石	102
《困学纪闻》元刻本考索	张骁飞	107
《韩鲁齐三家诗考》版本考辨	王京州	115
王应麟《诗经》学探析	陈晓兰	120
蒙学之冠《三字经》——兼论《三字经》的作(编)		
者及当代价值	戴松岳	133
南宋社会文化学家王应麟仕履系年考释	龚延明	142
论王应麟的学术渊源及其与吕祖谦之关系 ...	张三夕 杨 毅	161
王应麟师承考	杨 毅	174

论王应麟学统问题	苏费翔 (Christian Soffel)	181
论王应麟经世之学的转向	林素芬	202
汲古传忠,文献世美——甬上竹林王氏家族述略	张如安	217
王应麟先生故里与归葬地考释	王重光	236
近五十年王应麟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钱茂伟	240

试论王应麟《词学指南》的价值

祝尚书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又号厚斋,南宋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淳祐元年(1241)进士。他鄙薄当时事举子业者得到科名后便一切委弃,而以通制度典故为“通儒”,誓以博学宏词科自见,遂于宝祐四年(1256)中是科。历通判台州,擢秘书郎,迁著作佐郎。累迁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转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平生著述宏富,有《深宁集》一百卷,久佚,现有辑本流传。各类著作多达二十余种。《宋史》卷四三八有传。

北宋熙宁间王安石变法,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罢诗赋而用经义取士。这种改革的负面影响,是专习经义造成了文士写作水平普遍下降,文化历史知识严重匮乏,而冲击最大的,是朝廷、官府常用的四六应用文体的写作乏人,于是绍圣二年(1095)哲宗不得不下诏设置“宏词科”,专门选拔四六应用人才,实际上是对科举罢诗赋之流弊的补救。大观四年(1110)五月,改为“词学兼茂科”;绍兴三年(1133)七月,又改为“博学宏词科”,前后通称“词科”。对两次改名的原因,王应麟解释说:“盖是科之设,绍圣颛取华藻,大观倣尚淹博,爰暨中兴,程式始备,科目虽袭唐旧,而所试文则异矣。”^①再说得明白些,就是“博学宏词科”更注重“博学”,也就是更看重考生的“记诵”功夫。^②

① 王应麟:《词学指南序》,《词学指南》卷首。

② 有关宋代词科的设置、考试等诸问题,请详参拙文《宋代词科制度考论》,载拙编论文集《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

《词学指南》是王应麟专门研究宋代词科的一部学术专著。该书所记考试题目止于宋度宗咸淳十年(甲戌,1274),则是书当完成于入元之后。这时科举已废,其写作目的盖有总结宋代词科以保存“国粹”,为将来恢复传统之用的深意。原本单行,后附刻于《玉海》之末,即《玉海》二百卷,附《词科指南》为二百一卷至二百四卷。是书主要探讨词科备考和考试中各体文的写作法,并保存了许多难得的词科史料。因后代科举不设“词科”,而近代以来科举名声又很“臭”,故向不为学界所重,极少有学者专门“光顾”。^①但此书在文献学、文章学及宋代词科史研究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不应该受到如此冷遇。本文试为论之。

一、“编题”“编文”,总结了宋代类书的编纂方法

词科在大观间由“宏词科”改为“词学兼茂科”,绍兴初又改为“博学宏词科”,实际上就是由考试重“文”(词章)向重“学”跨出了两大步。所谓重“学”,说白了就是重“记诵”(即背诵)。宋代其他科目考试也是如此,如制科考试,几乎要求举子背诵所有重要的经、史、子文献,甚至包括经典注疏,当时就有人批评这是“穷以所未知,强以所不能”。^②而词科自改为“博学宏词科”后,重背诵的强度丝毫不减制科。考试政策决定了举子备考方法的取向。欲应改制后的词科考试,必须面对现实,用长时间、下大力气诵书、编题、编文。

《词学指南》卷一,^③就是专论应词科试的知识储备和资料准备,即如何编题、诵书、编文等,主要指示学者如何类辑资料。这里专谈编题、编文,并由此通观宋代众多科举用类书的编纂。

《指南》卷一首论“编题”,引东莱先生(吕祖谦)曰:

① 侧闻中山大学有一篇研究《词学指南》的硕士论文,未见。

② 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三六载淳熙十二年(1185)二月二十六日李嶷奏。

③ 本文为征引方便,以下简称《指南》(用王水照编《历代文话》本),并改称编次为卷一至卷四。

编题只是经、子、两《汉》、《唐书》、实录内编。初编时须广，宁泛滥，不可有遗失，再取其体面者分门编入。再所编者，并须覆诵，不可一字遗忘。所以两次编者，盖一次便分门，则史书浩博，难照顾，又一次编则文字不多，易检阅，如宣室、石渠、公车、教仓之类，出处最多，只一次编必不能尽。记题目须预先半年，皆合成诵，临试半年覆试，庶几于场屋中不忘。

吕祖谦是说，类编资料应分两步走，即先从他所框定的那些经、子、史书中进行“初编”，然后再分门编。所谓“编题”，据所举“宣室”、“石渠”等例，即指所设小类名目，也就是常说的类书子目。然后再取小类中“体面者”分门编入，——这里的“体面”，当是“脸面”的意思，也就是最符合门目原义、最能概括该目内容的标题文字，它像人的眼目脸面一样，是一种标识。初编的原则是“广”取，再编方是过细。之所以要分两次编而不是一次便分门，他说这样因为资料浩博，分两步便“文字不多”，有利于彼此“照顾”。吕祖谦曾于隆兴元年(1163)中进士、博学宏词两科，对科举时文有很深的研究，影响很大，上述编题法自当是其经验之谈。王应麟补充说：“凡作工夫须立定课程(原注：日日有常，不可间断)。日须诵文字一篇，或量力念半篇，或二三百字(原注：须分两册，一册编题，一册编语，卷帙太多，编六七板亦得)。”他还说：“编题用工数年，虽不能全无缺遗，然大概备矣。”总之用功须勤，不能间断，方可成功。

王应麟再引西山先生(真德秀)道：

始须将累举程文熟读，要见如何命题用事，如何作文。既识梗概，然后理会编题。经史诸子悉用遍观，其间可以出题引用并随手抄写，未须分门，且从头看，凡可用者悉抄上册。如《尚书》则《舜典》“望秩”、“禋宗”、“九官”之类皆录。一书毕，复理会一书，以详且精为先，不可少有遗缺。

他是说，先要熟读科场时文，摸清其写作特点和路数，这样的“编题”

方能有的放矢。真德秀也认为资料类辑应分两步,先是编题并遍观群书,“随手抄写”,这时“未须分门”;待“详且精”、“少有遗缺”之后才分门。辑录文字既要“遍观”,又要一本一本地精读。真氏不仅是宋末著名理学家,而且也曾开禧元年(1205)中博学宏词科,所论无疑也是自己备考的心得。

王应麟接着指出,读书、编题要掌握重点,“经书《周礼》题目最多,官名皆可作箴,制度名物皆可为铭为记。其次则《礼记》外三经皆有之,功夫多在三《礼》。有题目处须参注疏。次及《国语》、《战国策》、《史记》、两《汉书》……本朝题目须是盛德大业、礼乐文物、崇儒右文等事方可出(不必泛记)……(以下言子部书、集部书的重点,此略)”。总之,考试时凡可引用处“皆当遍阅搜寻,如前法编类,不可省略。俟诸书悉已抄过,然后分为门目”;“先理会一门竟,然后以次编纂。如谓历法,则凡经、史、百家所载历事悉萃为一处,而以年代先后为次第,如黄帝历为先,颛帝历次之,夏、商、周、鲁历又次之,本朝历又次之。它可类推。”

在“编文”中,王应麟又引吕祖谦语,列举了“皆须分门节”的一些重要典籍(如《左传》、《汉书》)、文章总集(如《文选》)、著名作家文集(如韩柳欧苏等)。“编文”即分门节录文字,这是具体操作,某些内容该入何门类,有时很棘手。王应麟提出了一些具体处理的意见:“如《左氏》‘三辰旂旗’之类皆可入车旗;如《二京》、《三都赋》所言居处皆可入官室;如西汉乐章之类皆可入郊庙、礼乐等处;如韩文《上尊号表》、《潮州谢表》皆可节入歌功颂德;……馀以类推。”至于“备四六之用”的资料类辑,可“长句作一处节(如‘乃心罔不在王室’、‘学有缉熙于光明’之类),四字作一处(如‘迄用有成’、‘熙帝之载’之类),两字作一处(如‘畴古’、‘若时’、‘燕及’之类)”。

以上是王应麟所述资料类编方法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他所论包括了师门前贤及自己的见解,带有总结性质,尤其重实际操作。那么其理论指导实践的成效如何呢?盖所编《玉海》是最好的证明。大型类书《玉海》,其实就是王氏当年为应博学宏词科考试而类辑的

资料。该书规模巨大,卷帙浩繁,在二百卷中凡分“天文”、“律历”、“地理”、“帝学”等等二十一门。又分二百四十余类,如“天文”分“天文图”、“天文书”、“仪象”、“圭景”四类。每类再分若干小类,如“天文图”共有三十一小类,包括“中宫”,“二十八舍”,“周易分野星图”,汉天文图籍,以及晋、梁、唐各代图籍,最后是北、南两宋图籍,以《黄裳天文图》殿尾。确定类、小类名目,就是所谓“编题”;每小类要摘录大量文献资料为其内容,这就是“编文”。如果说这是“地毯”似的搜索和类辑资料,那毫不言过,由此也可看出词科考试重“记诵”的强度,举子几乎是无书不读,无条目不记。

王应麟编《玉海》是为了自用,并非有意要编书传后,到元代后至元六年(1340)方才刊行。《玉海》虽是应试用的“类编”书,目的或不甚“崇高”,却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四库提要》曰:“其作此书,即为词科应用而设,故胪列条目率巨典鸿章,其采录故实亦皆吉祥善事,与他类书体例迥殊。然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宋史》所未详。其贯穿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他还编有《小学紺珠》十卷,《四库提要》称该书“分门隶事,与诸类书同”。如此看来,《玉海》是在广泛吸收和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纂辑成书的,可谓代表了宋代类书编纂的最高水平;而王应麟所总结的类书编纂理论,自然也代表了宋代类书编纂理论的最高水平。

宋代是个“盛产”类书的时代。究其原因,岳珂说得很明白:

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类书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汗牛充栋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翼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率携以入棘围,务以眩有司,谓之怀挟,视为故常。^①

当日市场上的类书可以“汗牛充栋”,流传至今的也有数十部之

① 《愧乡录》卷九《场屋类编之书》。

多,著名且质量较高的,如潘自牧《记纂渊海》一百卷,章如愚《群书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后集八十一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九十四卷、外集六十六卷等,也为数不少。^① 不过宋代像王应麟这样亲自动手、下功夫自编自用的却并不多,更多的是书坊请人类辑成书以射利。这些书动辄数十百卷,而质量却很差。举子在这种类书中讨生活以应付考试,国家则用考试取才,实在误人误国,所以当时有识之士对“编类”多持批评甚至反对的态度。说得“难听”点,书坊编刻大量类书以供举子检阅剽窃,实际上是学风浮躁、败坏的产物。但是,既然作为文化遗产流传了下来,就不能简单地一“骂”了之,在超越了科举功利之后,它们中许多仍然是很有使用或研究价值的文献;如《玉海》等的价值,就更不可小觑。

类书因多出于书坊,故很少有编者或他人的序跋,即便有,往往也对该书是如何编纂“出笼”的秘而不宣。如刘达可编《璧水群英待问会元》九十卷,有淳祐乙巳(五年,1245)友人建安陈子和序,只是称赞其书“条分缕析,纲举目张,每一门必附之以十数条类,每一类又附之以三四节目,宁贵乎尽而无遗,宁取乎备而无略”而已。于是,通过王应麟在《指南》中所揭示的编类过程和方法,我们很自然地可以联想并循此而考察宋代为数众多、卷帙纷繁的类书的编纂,以及它们的用途。比如《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类书类》著录洪迈《经子法语》二十四卷、《左传法语》六卷直至《南史精语》十卷等共八种共一百零五卷,陈振孙谓这些书“皆所以备遗忘”,只是洪氏“多取句法”。洪迈曾中博学宏词科,那么这些书显然是他精读经、史、子书后分类编题、编文而成,目的也是为了词科备考。《玉海》等虽是备词科考试所专用,内容上“与他类书体例迥殊”,但供如进士科等使用的类书的编纂,在原则和方法上应无二致。所不同的,王应麟是以“博览天下之书以著

^① 参见拙著《宋代科举与文学》第十四章《宋代的科举用书》,中华书局,2008。

于一书”^①的功夫编纂出来的，故质量上乘，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而书肆那些“以翼速售”的可以汗牛充栋的东西，多为拼凑抄撮、粗制滥造的劣品，故大多数已被历史所淘汰。

二、词科十二体“体式”，丰富了宋代文章学

本文开头说过，绍兴三年（1133）七月，宋高宗诏改“词学兼茂科”为“博学宏词科”。按绍兴法规定，考试“以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十二件为题，古今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②就是说，每次考试并非十二种文体都要全考，而是只考三场、每场二题，共考六题，即六种文体。每次到底考哪六种，则由出题官随机决定。所谓“每场一今一古”，“古”指历代故事，“今”指本朝故事。如《夏禹九鼎铭》，这是“古”，即“历代故事”；而如《代宰臣以下谢赐御制冬祀庆成诗表》，这是“今”，即“本朝故事”。

词科考试十二种文体的写作法，由于词科久废，后代学者很少有人关心。其实这是误解，十二体写作法研究的是文章学，而文章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是没有科举甚至古今之别的；况现存宋代文献中，当年科场十二种文体的作品还有不少流传至今，作为文化和文学遗产，也有研究的必要。

《指南》卷二引西山先生真德秀曰：“词科之文，谓之古则不可，要之与时文亦复不同，盖十二体各有规式。”这是说，词科的十二种考试文体既非古体，也不可完全称作时文，它有自己特殊的“规式”。故王应麟又引真氏曰：“凡作文之法，见行程文可为体式，须多读古文，则笔端自然可观。”则“规式”也就是“体式”，本文统一用常见的“体式”一词。他再引陈晦语曰：“读古文未多，终是文字体轻语弱，更多

① （元）薛元德《玉海后序》语。

② 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一一、《容斋三笔》卷一〇。

将古文涵泳方得。”总之，宋人强调“时文以古文为法”，而词科之文尤然。在宋代科举考试中，唯词科文体可说是“学以致用”，翻开宋人文集，多有“十二体”之文，若作过代言之官的就更多了。

绍兴博学宏词科的十二种文体，又可分为三类：一是四六文，包括制、表、露布、檄四种（其中表、檄等，汉、晋以前用散文，晋以后改用骈文）；二是四六或散体皆可，包括诏、诰二种；三是只能用散文的二种：序、记；四是韵语：箴、铭、赞、颂。十二种文体中，王应麟引真德秀语，认为“所急者制、表、记、序、箴、铭、赞、颂八者而已。若诏、诰，则罕曾出题，檄、露布，又军兴方用，皆尚可缓”。而“所急”的八种中，王应麟又引平斋洪公（咨夔）曰：“制、表，如科举之本经，所关尤重。”并举例道：“隆兴元年（1163）陈自修试颂及露布，冠绝一场，偶表、制中有疵，因不取。”^①这就是说，在词科考试中，制、表乃重中之重。这道理很简单：词科考试既以搜罗“词臣”为目标，而制、表是词臣用得最多的文体，故也最“重”。

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全面考察王应麟所论的十二种“体式”，唯从文章学的角度，分别选取四六、散文两体各二种，前者举所谓“重中之重”的制、表，后者举记、序，略引各家论述，以见王应麟对词科文体“体式”的研究。

1. “制”及其体式

“制”是皇帝的命令，秦以前称“命”，秦代改为“制”。它是所谓“王言”的一种，宋代用于官员除授和罢免。臣下作制是代皇帝立言，这对于封建时代的文人来说，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所以对其写作也特别留意。此种文体，宋代例用四六，因为“制用四六，以便于宣读”。^②

^① 《词学指南》，卷一。

^② 《词学指南》，卷二。

“制”成为考试文体之一，始于唐代翰林学士的入院试。宋代词科所试制，《指南》卷二载其格式为：

门下：……云云（“云云”为内容之省，为醒目，今在前加删节号。下同）。具官某，……云云。于戏！……云云。可授某官，主者施行。

制词的写作，真德秀以为三处最为重要，即破题、叙新除处、戒词。他说：

曰制曰诰，是王言也，贵乎典雅温润，用字不可深僻，造语不可尖新。制词三处最要用功。一曰破题，要包尽题目，而不粗露（首四句体贴）。二曰叙新除处欲其精当，而忌语太繁（推原所为之官，除授之意，用古事为一联尤好。……）。三曰戒词，“于戏”而下是也，用事欲其精切（须要古事或古语为联，切于本题，有丁宁告戒之意。……）。三处乃一篇眼目灯窗。……若夫褒辞，则亦须切当，文武宗室各用得休，平时先要准备。

关于破题，王应麟引吕祖谦曰：

制破题四句，或兼说新旧官，或只说新官。如自资政殿学士提举宫观、建节，上两句说提举宫观，下两句说建节，此兼说新旧官也。若四句只大概说藩屏方面之意，此只说新官也。其四句下散语，须叙自旧官迁新官之意，如“眷时旧德，肃侍燕朝”之类。

破题又叫“制头”，王氏进一步指出：“制头四句，能包尽题意为佳（如题目有‘检校少保’，又有‘仪同三司’，又换节，又带军职，又作帅，四句中能包括尽此数件是也）。若铺排不尽，则当择题中体面重者说，其余轻者于散语中说亦无害（轻者如军职、三司是也）。制起须用四六联，不可用七字。”又曰：“制头四句说除授之职，其下散语一段略说除授之意。……然只是大概说意，不可说得太深。”可见他们的目光都首先集中在破题，要点是必须“包尽题意”。如《指南》举孙觌《镇

洮军节度使除大尉制》为例，其破题曰：“门下：价藩经武，久资戎翰之良；帅阃畴用，增重本兵之寄。”王氏批注曰：“此制包尽前后任，又下语稳。”意思是“价藩经武，久资戎翰之良”两句说镇洮军节度使，而“帅阃畴用，增重本兵之寄”两句则说新除的大（太）尉一职，故四句“包尽”了题意。宋人特重破题，这固然与时文程式有关，但作文以开头最重要，也最难，它是全文的纲领，关系到文章的成败，今天写作也是如此，只是不必一定要“包尽题意”那么死板。

除破题外，制也特别讲究语言，必须典重、温润，用词下字不可轻率，因为它代表的是皇帝、国家，一定要严肃而有分寸。何谓“典重”（或“典雅”）？王应麟曰：“制辞须用典重之语，仍须多用《诗》、《书》中语言，及择汉以前文字中典雅者用，若晋、宋间语及诗中语不典者，不可用。”又引叶适（水心）曰：“荆公（王安石）取经史语组缀有如自然，谓之典雅，自是后进相率效之。”则所谓典重、典雅，即多用经籍、古书语，既具权威性，又有来历，雅致可诵。四六的特点是用事多，用事之法，王应麟引刘克庄（后村）曰：“四六家以书为料，料少而独特才思，未免轻疏；料多而不善融化，流为重浊。二者胥失之。”则“料”少固不可，“料”多也未必就好，而是要“融化”如同己出，不能生搬硬套。王应麟还特别指出，欲写好制词，熟读前辈四六大家如王安石、苏轼、汪藻、周必大等人的作品，“则下笔自中程度”；但也要注意：“场屋拟制与黻庭之文又不同，须全依定格。”这是说，考场的拟制与朝廷实际所行之制还有所区别，考场有考场的“定格”，举子必须严格遵守。

制又可分文臣除授制、除帅制、宰相制、中书舍人召试制等数类，大体格式相同，内容略有变化而已。

2. “表”及其体式

“表”是臣下向皇帝上书陈事所用的文体。《指南》卷三列“贺”、“谢”、“进书”、“进贡”、“陈请”数类。明代学者徐师曾《文体明辨序